

许纪霖 著

安身立命

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曾国藩	中国式的入世禁欲
张之洞	生于末世的一代儒臣
黄远生	忏悔中的精神升华
杜亚泉	「旧派中的新派」在五四前后的命运
梁漱溟	最后一
胡适	好政敌
林语堂	战士、
林同济	紧张而
沈从文	做志士
巴金	永远的
金岳霖	走出阈
朱自清	从象牙
闻一多	激情的
顾城	在诗意
史铁生	另一种理想主义
王小波	他思故他在
王元化	「我是十九世纪之子」

义的乌托邦

文景

安身

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立命

许纪霖
著



文
景

Horizo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许纪霖 著

出品人：姚映然
策划编辑：贾忠贤
责任编辑：周灵逸
营销编辑：雷静宜
封扉设计：好谢翔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刷：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制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720mm×1020mm 1/16
印张：39.5 字数：460,000 插页：2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88.00元
ISBN：978-7-208-15930-3/K·286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 许纪霖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ISBN 978-7-208-15930-3
I. ①安… II. ①许…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25245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主要从事 20 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近著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启蒙的自我瓦解》（合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合著）、《启蒙如何起死回生》、《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等。

许纪霖在文景

《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

《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Email: info@wenjingbook.c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书店联络：010-52831925

媒体联络：010-5218758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1 自 序

上篇 特写

第一编 在中西新旧之间

- 23 曾国藩：中国式的人世禁欲
- 31 张之洞：生于末世的一代儒臣
- 47 黄远生：忏悔中的精神升华
- 59 杜亚泉：“旧派中的新派”在五四前后的命运
- 70 梁漱溟：最后一个儒家

第二编 知识与心灵的世界

- 89 胡 适：好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乌托邦
- 107 周作人：现代隐士的一幕悲剧
- 123 林语堂：战士、名士与隐士
- 144 林同济：紧张而丰富的心灵

第三编 知识分子与权力体制

- 167 陈布雷：“道”与“势”之间的挣扎
- 184 丁文江：出山不比在山清

- 195 翁文灏：一个科学家的错位
201 蒋廷黻：瓷器店中的猛牛
211 叶公超：误入宦途侯门深

第四编 激情、豪气与虚无

- 221 沈从文：做志士还是绅士？
231 巴金：永远的安那其主义者
243 傅斯年：一代豪杰傅大炮
250 汪精卫：虚无主义的任性牺牲

第五编 思想的自我改造

- 267 金岳霖：走出阁楼之后
280 朱自清：从象牙塔到十字街头
306 闻一多：激情的归途
334 吴晗：可怜一觉开封梦

第六编 世纪末的知识分子

- 347 张中晓：思想史上的又一位先知
357 顾城：在诗意与残忍之间
365 史铁生：另一种理想主义
374 王小波：他思故他在
387 王元化：“我是十九世纪之子”

下篇 群像

第一编 知识分子的宏观图景

- 405 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考察

- 423 入世与出世
 ——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
- 440 外圆与内方
 ——现代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
- 458 超然与介入
 ——东西方知识分子比较与其他
- 468 “少数人的责任”
 ——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

第二编 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

- 515 重建社会重心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
- 550 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
- 569 帝都与魔都：现代中国的城市知识分子（1900—1937年）
- 599 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

附录

- 607 在刺猬与狐狸之间
 ——我的知识分子研究之路
- 624 后记

自序

我个人从事的研究领域，有三个分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思想史和城市文化研究。但最有心得和敝帚自珍的，依然是知识分子研究。我研究知识分子纯属偶然，我是“文革”以后第一届考入大学的77级的学生，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留校（华东师范大学），留校以后系里面让我教一门“中国民主党派史”的课程，后来发现八个民主党派历史太短，资料也太少，研究的空间很有限，反而对民主党派中的人物，那些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感觉我自己与民国知识分子是心心相通的，所以就不期而然地转向了知识分子的研究。

1987年1月份我在《读书》杂志发表了第一篇研究知识分子的文章《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与人格》，写民初记者黄远生的心路历程，是我研究知识分子的处女作。30多年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差不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主要从心态史的角度进入，从个案和群体的角度讨论中国知识分子从古代到民国为什么丧失了独立人格，背后的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是什么。接连在《读书》杂志和《走向未来》杂志发表了好几篇文章之后，约稿纷至沓来，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了某种危机感，觉得自己已经形成了一条依赖路径，不再有新意。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做思想史研究，读了不少政治哲学的书，试图把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第二阶段。2017年出版的《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

人、国家与世界认同》，是这个阶段知识分子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而我当下的研究则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我是一个有好奇心的人，总是想在旧的领域里面，搞搞新的意思。即使是知识分子研究，如果我们总是在一两个频道里面研究老话题，研究会慢慢变得单一、单调，让人有疲劳和重复感。本书所收集的，是我 30 多年来知识分子研究的文章，那已经是过去的文本，虽然依然有其价值与意义，但我想借本书新版出版之际，谈谈近几年来一直在思考的知识分子研究的新领域。

知识分子的世代交替

鲁迅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设想要写关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故事，最后没有实现；李泽厚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后记里面提出要写，最后他也没有实现。我在 90 年代中期曾经提出过一个 20 世纪六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框架，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也没有付诸实施。

我的研究框架将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按照五四和“文革”两个中轴，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1949 年以前的前三代为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1949 年以后是（“文革”前）“十七年”一代（1949—1966 年）、“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三代的区分标准有两个。一是知识结构。简单说来，第一代（晚清一代和“十七年”一代）的知识相对来说不那么现代，比较陈旧，而到了五四一代和“文革”一代，成为新知识的开拓者。我这里说的“文革”一代，主要是指在“文革”初期是红卫兵、红小兵，“文革”中期成为“知青”，“文革”之后又作为恢复高考之后考上大学的“新三级”（77、78 和 79 级）大学生，他们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一代人，20 世纪初和世纪末的两场思想启蒙运动，都是他们领导的。而后五四和“后文革”一代知识分子，却接受了完整的现代知识训练，成了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第二个观察角度是各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关怀。简单地说，晚清和“十七年”这两代人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一切以政治为标准。章太炎作为晚清一代，在东京讲课的时候，他的学生回忆说，他讲到学术的时候，自己都是昏昏欲睡，一谈到时政，立即两眼放光，滔滔不绝。“十七年”那代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政治意识特别强，比如王蒙在90年代初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提出一切都要以是否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标准来看人文精神。但是五四和“文革”这两代人，虽然也有政治关怀和知识关怀，但更多的是文化关怀，有一种林毓生所说的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路径取向。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国，说今后要20年不谈政治，给中国奠定一个文艺复兴的基础。我记得80年代我们那代人也有一种为中国重建启蒙的文化雄心。而后五四和“后文革”这两代人，则有比较强烈的知识取向，他们的政治与文化关怀，最后都落实到知识和专业层面。这里我特别补充一下，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以为“60后”“70后”就是“后文革”一代，现在发现直到1985年以后出生的才形成了典型的“新人类”，而“60后”“70后”只是过渡的一代知识分子。

这个六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框架，非常整齐，是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式，虽然具有表面的美感，但整齐的框架，固然具有参考价值，却未必能够展现世代交替中历史的复杂面相。这些年我开始重新思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代更替问题，试图从中国历史自身的演变与脉络出发，虽然不那么整齐，但是可能更契合历史本身的内在逻辑，而非外在的形式框架。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怎样的代际更替？先来看晚清。晚清的士大夫，如果细分的话，可以分为不同的三代：官僚士大夫、文人士大夫和革命“游士”。

从1860年代的自强运动到1894年甲午海战，主要是官僚士大夫领导变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这些晚清一代重臣与传

统正途出身的士大夫不同。虽然他们有功名，却基本是地方士绅，以军功显著得到提拔，有儒家的正统观念，在“理”之外，更重“势”，与正统出身的士大夫清流不同，有清醒的现实感，灵活实用，不拘泥于经典陈义，是清末自强运动的中坚。与之同时代的朝廷中枢官僚士大夫，乃是清流派，他们固守儒家义理，标榜名节，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与“论功利而不论气节”的洋务士大夫“浊流”迥然有别。

官僚士大夫，即使是改革派，因为他们与官家体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更注重的，是“保国”。晚清有“保种”“保教”和“保国”之争。康有为要“保教”（儒家道统），严复、梁启超要“保种”（中华民族），但曾国藩、张之洞这些官僚士大夫认为，“保国”是最重要的，这个“国”不是现代的 nation，而是传统的王朝。具体而言，“保国”就是保大清王朝。保住了大清，就保住了“种”与“教”。一切变革是以“保国”为核心，这是官僚士大夫自强运动的特征。

1895年以后，一批新的士大夫代替官僚士大夫，占据了历史的中心舞台，那就是文人士大夫。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文人，本来名不见经传，只是在广东、湖南这些边远的省份小有文名的举人而已，远离权力中枢。“公车上书”让他们闪亮登场，随后得到光绪帝的赏识，从地方精英摇身一变为国家精英。但“康梁”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不同，他们充满了一种文人的浪漫主义气质，有点像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中的文人那样，总是觉得政治应该如何如何，而非可能如何如何。整个戊戌变法也洋溢着文人的理想主义激情。

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不仅是精英选拔制度，而且是中央与地方关联的枢纽。朝廷通过科举考试，将各地最优秀的人才精英吸纳到体制内与中央，避免沉淀在地方，特别是体制之外，以免构成对朝廷的潜在威胁。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使得朝廷不再对地方精英有过去那样的凝聚力，官场也不再成为读书人的唯一选择。自此各地精英通向中央之路被拦腰切断，沉淀在地方，活跃于官场之外。这就是晚清

日趋活跃的绅界。

读书人分为官僚士大夫和文人士子，前者是被中央吸纳的进士、翰林，属于国家精英；后者是暂时未入仕的举人、秀才，属于地方名流。官僚士大夫在权力中枢活动，但文人士大夫的活动空间却在地方和民间，他们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公共领域”：民间的学校、媒体和社团。他们不是以权力，而是以制造舆论影响天下。光绪失势以后，改革几乎没有在权力中枢发展的空间，他们的活动舞台在哪里？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学校、报纸和社团。这些都是不见于古代中国，而在 1895 年以后戊戌维新中出现的。文人士大夫活动的空间，不再是体制内部，而是体制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

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绝对王权国家里面，社会与政治的变革往往是从边缘开始，逐步向中心渗透，地方的成功，倒逼中央改革。晚清的变革，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皆是如此。而执掌改革牛耳的社会重心，却是一个倒过来的从中心流落到边缘的逆向过程：首先是体制中心的官僚士大夫，其后是体制边缘的文人士大夫，最后是因科举制废除而被抛到体制外部的革命“游士”。清末民初是一个旧秩序解体、新秩序尚未建立的转型年代。当大量“过剩的劳动阶级”（游民）与“过剩的知识阶级”（游士）溢出秩序的时候，革命就不远了。

登上晚清历史舞台的第三波知识分子，是 1905 年以后的体制之外的边缘知识分子：游士，如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等。同盟会是一个典型的游士阶层组织，他们的基本队伍是华侨、商人、会党、失意秀才、落魄的留日学生和职业革命家。这些后来领导辛亥革命的游士们与日本领导明治维新的武士阶层不同。明治维新虽然是下层精英的革命，但伊藤博文这些武士是旧政权的一部分，是体制内的游士，但晚清的革命者已经是旧秩序瓦解中的体制外游士，他们只有在新秩序中才有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前途。晚清的游士革命者类似于 19 世纪

末俄国第二代平民知识分子，从别林斯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大都是俄国僧侣阶级的后代，身为统治阶级，却处于边缘化地位，只有革命一途。

如果说晚清的三代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是走向现代的传统士人的话，那么民国以后，第一代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当中诞生了。新文化运动一般而言是以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办为标志，但《新青年》原来默默无闻，影响远远不及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一直到1917年陈独秀到了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与北大结合，新文化才真正成了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2017年是真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像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陈寅恪、周作人这代人，大多出生于1880—1895年之间，他们不再走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大夫老路，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职业，比如教授、报人、编辑、作家，等等，而且在知识结构上，虽然幼年也诵过四书五经，但基本是在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洋学堂中得到教育，后来又大都放洋日本或欧美留学，对西方文化有比较完整的、直接的认知。这是开创现代中国新知识范型的一代人，但在文化心态、道德模式等方面依然保存着中国传统的不少特点。

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崭露头角。用殷海光先生的话说，可以称之为后五四知识分子。这代人实际上分为前后两批，前一批出生于1895—1910年之间，他们在求学期间直接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是五四中的学生辈（五四知识分子属于师长辈），这代人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有很好的专业训练。如果说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在知识结构上都是通人，很难用一个什么家加以界定的话，那么这代知识分子则是知识分工相当明确的专家，比如哲学家冯友兰、贺麟，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政治学家罗隆基，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文学家朱自清、闻一多、巴金、冰心等。前两代人是文

化精英，主要靠社会影响出名，而这代人的声望主要局限在知识圈内。五四一代开创了新知识范型之后，后五四一代做出了一系列成功的范例，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和学术的高峰主要是这代人的贡献。后五四一代中的后一批人出生要晚一些，基本在1910—1930年之间，他们在求学时代接受了五四以后新知识和新文化完整的熏陶，却生不逢时，在即将崭露头角的时候，被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耽误了他们整整30年光阴，直到80年代以后步入中晚年时，才焕发出学术的青春。五四和后五四知识分子，虽然从年龄上来说是两代人，但从文化类型上说，后五四一代处于五四一代的延长线上，可以视为文化上的同代人。

之前众多对晚清和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都以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来观察不同代的代际更替。事实上，新与旧、中学与西学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在晚清，新学镶嵌在传统的框架之中，而到了民国，旧学又会以现代的方式再度展现。这就是我最近在研究中特别注意到的两个同属世代交替的知识分子流派：“旧派中的新派”与“新派中的旧派”。

先说“旧派中的新派”。在1895—1925年的思想转型时代之中，有两代启蒙者：第一代启蒙者是晚清末代士大夫中的新潮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第二代启蒙者是民初第一代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这些在晚清领时代风骚的启蒙先行者，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最初一代新潮派已经“老”了，他们被一般年轻人视为旧派人物，或者说是“半新半旧”人物，就像有人批评杜亚泉那样：“你说他旧么，他却像新；你说他新么，他却实在不配。”但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依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形成了“另一种启蒙”，只是被后人忽视和低估了。

“新派中的旧派”是民国以后出现的。最典型的，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出现的学衡派知识分子。与“旧派中的新派”不同，他们在美国名校受到系统的、良好的知识训练，在他们看来，西方文明最精

髓的部分，是古希腊的人文主义传统，而胡适等人引进的以科学为中心的机械主义和卢梭发端的、滥情式的近代浪漫主义，是西方文明的末流。在 20 世纪 20 年代，新学阵营中有明确的本民族文化意识的，当数陈寅恪和吴宓。这一文化自觉表现为陈寅恪所说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其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继承的是晚清曾国藩、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传统。

中国的“游士”有三代人：晚清的同盟会知识分子、国民大革命中的知识分子和中共革命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分别是 20 世纪上半叶三次大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前面我已经介绍了晚清的革命知识分子，下面讲一讲民国中的两代革命“游士”。

辛亥革命之后，稳定的立宪秩序迟迟未得建立，而新型的现代教育体制一方面形塑了等级化的社会职业机制，另一方面又生产出大量过剩的新式知识分子。除了少部分留学欧美和名牌学校出身的大知识分子之外，许多人在社会等级化的职业结构中找不到自己理想的工作，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对现实怀有深刻的不满。这些在民国知识和社会结构中不断被生产出来的新型“游士”，就成为 1925 年之后国民大革命的领导力量。

陈永发教授和王奇生教授的研究都发现，1925—1927 年的国民大革命乃是一场“学生的革命”。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内部多以“同学”互称。以广州时期的黄埔军校为例，所招的学生除个别有大学背景外，大部分都是小学毕业，或在中学读过几年书，然后经由各种社会关系介绍来报考黄埔，基本都是中小知识分子。从家庭背景来看，有的学生来自书香门第，有的是城镇居民，有的是乡绅子弟，但大部分是农民的孩子，而且很多来自中下等生活水平的家庭，甚至有一小部分家庭贫困，生活艰难。黄埔的学生可以说是“有些知识但又没有充分知识”的学员，基本来自社会底层，这和北大完全不同。北大以大知识